



〔故地往事〕

仲子读书处：春秋时期儒家胜迹

□吴济夫

泰安市东平县斑鸠店镇西南2公里处，有一个生活着4000多位居民的山村，村头遗留着一处春秋时期胜迹——“仲子读书处”。仲子，姓仲，名由，字子路，是“孔门十哲”之一。

据《刘氏族谱》记载，明代永乐年间，刘姓族人自山西洪洞县迁居到该村，因村边山上建有子路祠堂，传为仲子读书处，故将该村命名为“子路村”，足以说明这个村崇尚儒家先贤、喜好读书之风。

“子路村”北临古济水(今黄河)，南依青龙山，依山傍水、林木繁茂。村庄体现了先人逐水而居的选址生存理念。

仲由(公元前542年—公元前480年)，鲁国卞(今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)人，是孔子弟子中年龄比较大的一个。他一生跟随孔子40余载，包括从学和周游列国，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。

春秋时期，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，前往齐国时，途经青龙山。青龙山上有一种特殊的石头，像一节竹子嵌在里面，唤作“竹石”。青龙山顶寸草不生，只有一水洼，唤作“龙潭”，常年不涸，因此这里自古就有“竹石无墨千秋花，龙潭云起万丈虹”的说法。

孔子师徒在这里歇脚，看到龙潭云起，勤奋好学的子路忘却疲乏，在山崖上坐下，探囊取书展卷捧读。孔子因此说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”，意思是，“仲由在学问或技能方面已经有很高的造诣了，可谓升堂了，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。”意思是仲由的学识还不到家，不够精深，成语“升堂入室”即出典于此。

当地人为了纪念儒家代表人物子路锲而不舍、勤学苦读的精神，不但将村名改为“子路村”，村中还建有纪念物。古碑文记载，汉武帝时推崇儒家思想，后人此地修建了子路庙、子路祠，即仲子读书处。

仲子读书处始建于北宋，占地面积约4.6万平方米。清顺治八年重修，道光九年版的《东阿县志》(卷一)中记载：“百木(墓)山西(注：应为山东南)有子路读书处，宋嘉祐四年，里人刘可秩、刘可隐等建子路祠堂三楹，久圯。”今存仲子读书处，是清同治七年重修的。《张秋志》也记载，这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，成为东平县旅游景点之一。

仲子读书处坐落于“子路村”西端，在青龙山北凸山峰东麓山坡的密林间，此处古朴、幽静的院落依山而建，坐西朝东。

穿过村中崎岖的山道，攀登而上，由坡道登11级石阶，就可以到仲子读书处山门前月台，在这里可以俯瞰“子路村”，雾气氤氲、绿荫浓郁。

山门楣额横书五个字体工整、笔力遒劲的楷体金光大字：“仲子读书处”，为清代刘洪恩题写。山门为坚木

制造，左右门框以石代木，磨制光滑，上边镌刻楹联，但现在已经难以辨认。

仲子读书处以大门、二门、仲子祠正殿为中轴线，左右各一瓦殿，成为逐级升高的三进院落，可谓苍松翠柏、穹隆荫翳、古色古香，构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建筑群。

仲子读书处正殿仲子祠、读书阁，因年久受损，今人又在原址上重建其阁，刻碑铭记。

重建的仲子读书阁与原来的样式相同，为立山式建筑，面阔三间，鳞瓦盖顶、滴水勾檐、精致玲珑、古朴大方。大殿雕梁画栋、气势雄伟，南北配殿亦十分壮观，成为东平境内的一大景观。仲子读书阁内原有仲子泥塑金身坐式巨像，高1.7米，仲子像朱砂红面、满发束顶，身着蓝袍，左手拿书右手按膝，聚精会神专心读书，后来被除掉。大殿北壁嵌镶清代同治七年《重修子路仲夫子读书阁碑记》，碑高1.7米、宽1.8米。

正殿攀梁石柱上刻着楷书楹联：“从政当年蒲邑千秋传治绩；读书此地谷城百代振雄风。”上联说的是，周敬王三十三年，子路被卫国聘为蒲邑宰，此为长垣(今河南省长垣市)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任县令，仲由任期间勤政爱民、重视教化，筑堤挖沟、兴修水利、防御灾害，深得当地人民爱戴。三年之后，孔子偕子贡来到这里，看到此地大变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子路政绩卓著，千秋流传；下联说的是，仲子读书阁属古县东阿，又曾属阳谷城，他是读书好学的先贤风范，曾振起此地百代儒风。

仲子读书阁处正殿前有两个方形石柱，上刻对联：“学海文烂源分泗水；春风化雨道祖尼山。”两幅楹联均为宋代刘可秩、刘可隐撰书，赞颂仲子的勤奋精神，追溯儒家文化之源。

“子路村”儒风兴盛不衰，历代均设教于子路读书阁。明清两代，这里走出进士、举人、禀生、贡士、秀才达七十余名。比如，进士刘三泉清顺治十四年中举，曾任江西零都知县，购良田20顷献给子路阁，资助师生薪伙之用。康熙三十五年，刘德栻兄弟二人乡试中举，在“子路村”北侧东西大道上修建了“同胞乡荐”坊。同治六年，子路读书阁一年考出六个秀才。民国六年，子路读书阁全班学生皆升入高等学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子路读书阁设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班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。

相传仲子身材魁梧，练就了一身好武艺，他跟随孔子外出时，每遇到危难，常常挺身而出，抗击强暴。孔子依据其拳路特点定名为“子路八卦拳”，先传入开封，后传于黄河沿岸诸县。“子路村”人不仅承袭儒家文化、习好读书之风，而且喜爱“子路八卦拳”。“子路村”武术遐迩闻名，附近各山庄、大村古庙会、元宵节，常邀请他们表演，并受到热烈欢迎。

□李学朴

武松打虎是施耐庵所著《水浒传》中的著名故事，主要讲述武松回家探望兄长，途经阳谷县的景阳岗时，至酒家沽饮十八碗，醉后欲行赶路。酒家告以岗上有虎伤人，劝其勿行，武松不信，在岗上果然遇到一条“吊睛白额大虫”。武松奋起平生之力，以双拳将虎打死。

据《阳谷县志》记载：“景阳岗在县城四十里，沙丘起伏，莽草无涯，古木参天，人烟稀少。”

作为艺术描写，武松随身携带哨棒，人棒同行，成了人物的标志，在打虎中也打出了好戏。一根哨棒，说白了就是棍棒，人们经常见到，实在是普通极了。可是，在施耐庵的笔下，这根普普通通的哨棒，对于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刻画，环境气氛的渲染，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。

最早注意到这根哨棒的，是明末清初著名《水浒传》点评家金圣叹。他在《第五才子书》中批点出作者“十八次”提到哨棒(还不包括哨棒余波)，写了两段评语。其一是在“哨棒七”处：“一路又将哨棒特特处处出色描写，彼固欲令后之读者，于陡然遇虎处，浑身依仗此物，以为无恐也，却偏有出自意料外之事，使人惊奇。”其二是在“哨棒十六”处：“半日勤写哨棒，只道仗它打虎，到此忽然开除，令人瞠目噤口，不敢复读下去。哨棒折了，方显出徒手打虎异祥神威来，只是读者心胆堕矣。”

在这里，金圣叹点明了这根哨棒对于艺术氛围的渲染和反衬武松性格“异祥神勇”的作用。施耐庵特地一路上描写这根哨棒，似乎是为了给读者这样的印象，武松将凭借它打杀老虎。可是，当老虎陡然出现时，哨棒竟然折了，这样就造成了紧张、惊险的气氛，使人“瞠目噤口”“惊杀”，乃至“心胆堕”，从而表现出武松“徒手打虎”的异祥神威来。

因此，断棒打虎，“断”得出奇。武松酒醉踉跄，偏又遇上老虎。他在惊乱中躲过了老虎的一扑、一掀、一剪的“下马威”之后，得以转过身来，“双手抡起哨棒，尽平生之力”向老虎劈去，岂料武松一棒劈到了枯树上，“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，扑将来……”

这棒断得蹊跷。粗看，不该断，武松如此江湖好汉，怎会做出这等莽撞之事？细想，断得好，武松有超凡本领，可他面对吃人如麻的老虎，也惊得出汗，以致忙中生乱，但是正是这“棒断机失”，方显出英雄本色。武松面对老虎，马上就又镇

定下来，刹那间“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疙瘩地揪住，一手按将下来”。

至此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棒折失利，正是为武松打虎精心设计的“典型环境”。武松携带的哨棒折了，老虎又再次扑落到他面前，此时刻不容缓，只能就势丢下断棒，用拳用脚与老虎“近战”“肉搏”，也正因此，“武松打虎”才能够脍炙人口。

在华夏英雄谱上，打虎者甚众，就是同一部《水浒传》中，也有李逵沂岭砍虎、解氏兄弟用钢叉药箭取虎等。

这样一比较，我们会益发感到武松当初带棒上岗，“带”得出俗了。

分析武松敢于只身夜过景阳岗的原因，人们大都认为，武松除了仗着一身超人武艺外，更主要的是与店主人一番争执后骑虎难下，这些当然是有道理的。但是，不能忽视的是，武松最后敢于过岗，哨棒为他壮胆不少。

武松在《水浒传》中一出，就随身携带着哨棒，虽然上岗前，武松还优哉游哉，可是，上岗后他就不得不存三分戒心，“一只手提着哨棒”了。就是在酒力发作后，他躺倒在大青石上时，也没有忘了“把那哨棒倚在身边”，随时准备迎敌。施耐庵塑造的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打虎英雄，却为何让他带着武器上岗？奥妙在于，这不但无损武松的打虎神威，而且更有助于把武松区别于那种只凭一时冲动的“匹夫之勇”。

由上可见，一根普通的哨棒，经过施耐庵匠心独运地一再渲染，的确显示了武松的“身份”。哨棒，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极有特征的艺术细节。武松一路上哨棒不离身，因为他不是腾云驾雾、口吐飞剑的仙客。武松闯荡江湖、洞察世情、精明干练，他手中的哨棒“腾挪变化”，便是他的“身份”的具体显现。

如果明知山上有虎，唱着高调，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，这是莽撞、可笑，不是真的神勇，自然也就失去了武松的“身份”。正因为哨棒不离手，而真到打虎时，哨棒又不巧折断，在万分急迫之中，武松只好赤手空拳与虎搏斗，将老虎打死，这才显示出武松的“异祥神勇”来。

在武松打虎这场戏中，哨棒确实被渲染得声色不凡，除打虎外，更有折棒、丢棒、寻棒的表演，真是一棒三“折”，波澜层生、曲尽其妙。

也许，这就是“武松打虎”这段情节能够达到既神奇又真实的艺术境界，因而具有如此动人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吧。

〔文化杂谈〕

武松打虎与哨棒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l@163.com